

# 大师之大

## 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

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；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

在中国破家亡的民族生死关头，为了让中国教育文脉得以延续，为了建国复兴的教育大计，并使无校可归的师生不致失学当亡国奴，受奴化教育，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、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、清华大学校长蒋梦麟、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、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、同济大学校长陈维恒、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（CIC）联合发表声明，揭露日本侵略军破坏中国教育机关的罪行。提出了「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」的口号，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，将一些高校迁往内地办学。

家国情怀



三军可以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；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

联大师生抱定此志气，众志成城是战时中国的一个缩影，正应了南大张伯苓对学生慷慨激昂的教导：「中国不亡，有我」

重观名节

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舍生取义，杀身成仁，浩然之气

崇尚骨气

贺麟没有将学术作为通向权力的阶梯，也未因结交蒋介石而脱离学术。他洞悉最容易左右学术的是政治因素，撰文呼吁：「最易而且最常侵犯学术独立自主的是政治力量，当推政治。政治力量一旦犯了学术的独立自主，学术便陷于专制，反民主。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，不能不保持学术的纯洁，同时在政治上也保持了民主。政府尊重学术，亦不啻尊重民主。」



不为五斗米折腰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

在每次国民参政会上，周炳琳言辞犀利，不留情面，令国民政府感到头疼，如坐针毡。被周炳琳责问的官员，往往急得满头大汗，成为媒体报道的花絮和笑料。抗战中期，国民党当局因通货膨胀引发的民怨沸腾，置若罔闻。有一次召开国民参政会，周炳琳在会上批评通货膨胀，孔祥熙听后辩解「没有通货膨胀，孔祥熙相对地指出：『闹到钞票发行到用扫把扫，才算通货膨胀，时无以言对，下不了台，蒋介石只好出面为孔辩护。』」

不畏权势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刘

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

梅贻琦



# 大师之大

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



刘宜庆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**

大师之大：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 / 刘宜庆著. --  
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13. 1  
ISBN 978-7-5399-5968-9

I. ①大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—教授—生平事迹 IV. ①K825. 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14605号

---

书 名 大师之大：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  
作 者 刘宜庆  
责任编辑 黄孝阳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文艺出版社（<http://www.jswenyi.com>）  
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-83670231  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00×1000毫米 1/16  
印 张 20  
字 数 300千字  
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，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968-9  
定 价 32.80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國立西南聯合大學

## 序言

### 学问家的人世情怀

在那苍黄翻覆、陵谷变迁的大时代，在那风云变幻、波澜壮阔的岁月里，历史的浪潮将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推上了风口浪尖，他们在改变中国命运的同时，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。

一株会思想的芦苇，在 20 世纪中国两大政治力量狂风暴雨般的冲击下，注定一生不得安宁。

在 20 世纪剧烈变革的中国，当学术遇到政治，当知识分子面对政客，产生了悲剧，也铸就了风骨。这是个沉重的话题，也是一段伤心史。

联大教授经历了政治上的种种磨难，付出了尊严、血泪和生命，这难道是知识分子参政的魔咒？

### 位卑未敢忘忧国

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经历了抗战的烽火，在日军飞机轰炸中，弦歌不辍，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；在跑警报的动荡之中，为民族文化薪火相传，

潜心治学，留下大量经典的学术著作。外敌入侵，半壁江山沦入日寇铁蹄之下，国破家散、民族生死存亡之际，西南联大教授秉承士人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传统，一方面以文化学术抗战，另一方面关注时局，议政参政，反对独裁，呼吁民主，推动宪政运动的开展。西南联大学子则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，数次掀起投笔从戎的热潮，一千多名学子参加了军队，不少人为国捐躯，血染疆场。

生于晚清，学于欧美，西南联大教授学贯中西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他们身上融合，是他们的精神印记。他们身上不但有中国传统的士人精神，而且还有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。

闻一多面对黑洞洞的枪口，拍案而起；朱自清不顾病衰之身，不吃美国救济面粉。闻朱之死，其实就是中国传统士人悲剧的一个翻版。朱自清在1947年7月写的一篇文章《论气节》中说：“气是敢作敢为，节是有所不为——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。忠而至于死，那是忠而又烈了。”

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和时代的代言人，他们所具有的品格集中表现为：独立精神，自由思想，言论自由，倡导民主，人格独立。事实上，士人精神与现代品格已经水乳交融——家国情怀忧天下，不畏强权争自由。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议政、参政、从政，出发点就是爱国，他们的底线就是独立、自由。与传统的士大夫相比，法制人权这些西方文明的核心观念，与新文化运动中的“德先生、赛先生”，成为联大教授的精神底色。

罗隆基在《益世报》议政无所顾忌，遭遇暗杀的子弹，仍不改对民主宪政的诉求。抗战期间，他与西南联大的诸位参政员极力推动宪政运动。在国民参政会上，张奚若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，蒋介石感到难堪，打断他的发言：“欢迎提意见，但别太刻薄！”张奚若一怒之下，拂袖而去。下一次参政会开会时，重庆国民政府并没有忘记他，给他寄来开会路费和通知，张奚若回电：“无政可参，路费退回。”

西南联大教授有一个很好的传统：坚守学术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，不党不官，人格独立，为社会代言，为百姓请命，行使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的权利。

“违千夫之诺诺，做一士之谔谔。”西南联大教授将双重身份——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的风骨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担当——完美结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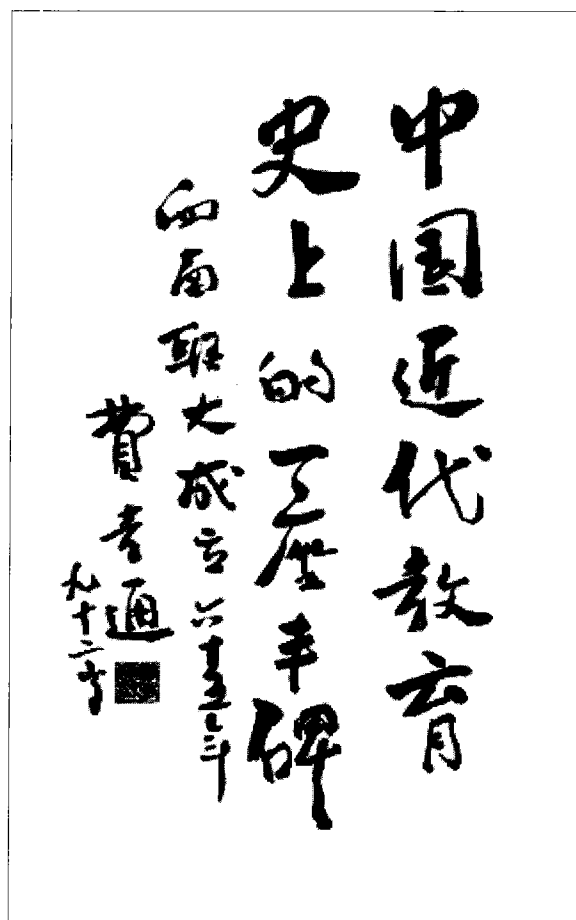
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不管与政治发生何种联系，他们有人格操守，进退自如，这就体现了学者的人格境界。诚如梁启超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所说：“所谓‘学者的人格’者，为学问而学问，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。故其性耿介，其志专一，虽若不周于世用，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，必赖此等人。”

“我头顶有繁星闪烁，我心中有真理永在。”这句康德的名言，让人想起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文中写下的金玉良言：“惟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，与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。”在20世纪动荡的中国，一切眩人耳目者，不过是一片过眼烟云，惟有真正的精金美玉才为后世所宝。西南联大留下的精神资源，联大教授与政治之间的宝贵经历和惨痛教训，正是“真正的精金美玉”。

## 君子“和而不同”

“党”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，多带有贬义的色彩。孔子云：“君子不党。”《战国策·臣道》载：“朋党比周，以环主图私为务，是篡臣者也。”封建士大夫为争权夺利，排斥异己，必然“结党营私”、“党同伐异”。唐朝后期，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不同派别的争权斗争，史称“朋党之争”。而崇尚气节的东林党，靠士林清议或士人牺牲，并不能挽救明朝的倾覆；甚至可以说东林党争，加重了明朝的危机。

以上所说的党，是封建社会的政治集团，并非近代意义的政党。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是中国同盟会。1911年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，发动武昌起义，推翻了清王朝，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。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后，宋教仁以同盟会为核心，联合国民公党、国民共进会、共和实进派等党派，组成中国国民党，试图走多党议会制之路，孰料刚刚起



费孝通为西南联大成立 65 周年的题词

步就已经到了尽头。1913年3月20日，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的子弹击中，议会政治的理想倒地。“为宪政流血”的宋教仁，是民国初年政坛上的一缕亮光，转瞬即逝。

民国初年，政党林立，互相倾轧。1912年8月的《真相画报》刊登了一幅漫画，上面题了这么几句：“甚么子叫党，甚么子叫派，原本一伙人，也进谗言把他害；甚么子叫改，甚么子叫革，排挤与钻营，更比从前了不得。”事实上，这些所谓的政党很大一部分其实难以称为真正的政党，他们的形态其实和历史上的朋党倒是一脉相传。

1924年1月，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“一大”上，孙中山提出了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，并效仿苏联建立革命军队。学者邓野在考察民国的国共政争时说：“民国政治的根本特征在于，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，政党作为政治团体的同时，又是一个武装团体，武力是政治的动身点和终极根据。这一点形成了民国政治的根本逻辑。”

当深谙西方现代文明精髓的公共知识分子遇到中国式政党，又会发生怎样的碰撞呢？

施蛰存在抗战初期，任教于云南大学，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交游甚密。他谈文人与政治、政党之关系：“四一二后，我们这些人只有死的份，没有活的机会。戴望舒、杜衡和我都是独生子，我们都不能牺牲的，所以都不搞政治了。”施蛰存对政党有着清醒的认识，他引用葛里尔哈尔十八世纪的名言：“所谓政党，是指大多数人牺牲，少数人掌权享受。”

国民党训政时期，胡适、罗隆基、钱端升等人在《新月》《益世报》《独立评论》等报刊上，集中批评国民党“一党独裁”、“以党治国”、“党在国上”的做法。在日寇步步紧逼华北的情况下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边呼吁团结抗日，一边呼吁民主政治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在“团结御侮”的大背景下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将抗战胜利的希望，寄托于执掌政权的国民党，纷纷支持国民党，表达一致对外的决心。



战前，国民党在全国的大学中基本没有建立基层党组织；战时，在各大大学普遍建立国民党党部后，西南联大出现一股加入国民党的潮流。1940年，西南联大各院院长、各系主任，多数加入国民党。据学者王奇生的研究，1944年1月西南联大区党部召开党员大会，出席党员79人，请假6人，合计85人，其中教授42人，教员、教官、助教、研究生共25人，职员14人，学生4人。西南联大的教师，大约40%加入了国民党。

尽管西南联大有如此数量的国民党籍的教师，但这并没有冲淡西南联大“民主堡垒”的色彩。西南联大的教授治校模式，也并没有因大量的国民党党员而有明显的改变。事实上，联大区党部对党员的管理相当松散。联大教授加入国民党并非强制。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拒绝加入国民党，他表示，如果强迫他加入，宁可辞去法商学院院长一职。张奚若甚至登报声明，自己不是国民党党员。另外，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也多次拒绝加入国民党（直到1944年才加入），并未影响其职位。

在西南联大，像金岳霖、汤用彤这样与政治和政党自觉保持距离的教授，有很大一批。即使在硝烟密布的抗战时期，他们仍然可以做一名纯粹的学者，不过问政治，不加入政党，能够保持独立的身份，拥有自由思想的空间。

抗战后期，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溃败，政治上的一党专政，再加上严重的腐败，导致不少联大教授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延安。延安中共的政治主张，比如成立联合政府，得到联大教授的响应。而民盟的成立，也吸引了一批思想激进的联大教授。“何妨一下楼”的闻一多走出书斋，从一位纯粹的学者成为振臂疾呼的民主斗士，闻一多的转变是联大教授的一个典型。

学者雷颐分析：“在时时面临民族危亡的近代中国，要成为对政治毫不关心的学者几乎是不可能的。闻一多由对政治的不甚关心到全身心投入其中，由对共产党的敌视、反对转为对该党的坚决支持、拥护，是颇具代表性的。”

1945年抗战胜利后至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这一年的时间，“一二·一”运动和“李闻血案”，促使联大教授政治立场产生分化，有的向左走，有的向右转，还有的试图走中间道路。1949年，向右转的联大教授去了台湾和海

外，而大多数联大教授选择留下来，拥抱一个崭新的时代。等待他们的会是怎样的命运呢？

## 不同的选择，迥异的结局

西南联大教授生于晚清，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封闭的帝国。这是中西激烈碰撞的时刻，古老的农耕文明遭遇了上升的工业文明。内忧外患，晚清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。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新的探索，中国人的现代“启蒙”于此开始。国家独立，民族富强，便成了生于晚清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终极梦想。
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。他们的梦想实现了，当年崇尚人格独立、思想自由的联大教授，投入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。其中，既有自我批判思想改造成功的急先锋钱端升，也有经过多次检讨未能过关的冯友兰、潘光旦。作为受过西方文明教育的公共知识分子，放弃自己的身份，与旧我彻底决裂是非常困难的。

1957年，罗隆基、曾昭抡、潘光旦、费孝通在“反右运动”中，无一不被打成右派。吴晗在文革中惨遭折磨而死，连其夫人、养女都被株连。

联大教授代表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，他们是联大模式的历史标杆。1949年之前，国民党是中国的执政党，知识分子的形象是西装或者长袍；1949年之后，共产党是执政党，知识分子的形象是统一的中山装。联大教授在历史的剧变之中，在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，身份是割裂的。考察联大教授与国共两党的关系，可以看出联大教授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是怎样消失的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当年的西南联大教授幸存者已不多矣，华罗庚、钱端升、贺麟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经历沧桑巨变，往事不堪回首，白发皓首一老叟，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，他们将加入中国共产党视为人生最后的归宿。不知他们曾忆否，当年在昆明的那一段前尘往事？

## 序 言 学问家的入世情怀

### 第一章 南渡：空前绝后的西南联大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仓皇的北平.....      | 002 |
| 长沙临时大学.....     | 007 |
| 徒步三千，流亡万里 ..... | 011 |
|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.....  | 014 |

### 第二章 捐躯赴国难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长沙的声音：到前线去！ ..... | 023 |
| 韦君宜的抉择.....       | 028 |
| 联大总动员.....        | 032 |
| 远征军里的“学二代” .....  | 039 |
| 驼峰“生死线” .....     | 042 |
| 远征军的非人生活 .....    | 047 |
| 怒江哀歌.....         | 052 |
| 突击队里的书生 .....     | 055 |

### 第三章 他们，改变了中国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张伯苓与蒋介石的是是非非 ..... | 059 |
| 大学校长的困局 .....      | 072 |
| 从阶下囚到座上宾 .....     | 081 |
| 哲学的王冠与权力的柄杖 .....  | 090 |

### 第四章 家，国，天下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心跟着国民党的姚从吾 .....  | 100 |
| 华罗庚：人生曲线谁求解 .....  | 114 |
| 致力于民主的教育家周炳琳 ..... | 127 |
|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钱端升 .....  | 145 |
| 张奚若的勇气和担当 .....    | 156 |

### 第五章 教授、民盟与中国的未来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至今未改正的右派 .....    | 167 |
| 一代宗师曾昭抡 .....     | 189 |
| 费孝通：虽九死其犹未悔 ..... | 195 |
| 闻一多喋血西仓坡 .....    | 206 |

### 第六章 做“呐喊”的中国人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“倒孔运动” .....   | 222 |
| 不受欢迎的来访者 ..... | 229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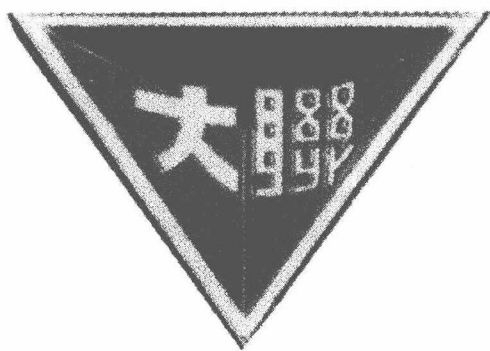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美国副总统的来访 .....       | 231 |
| <b>第七章 西南联大与五四运动</b> |     |
| 1944：五四旧梦 .....      | 238 |
| 1945：历史的叉路口 .....    | 243 |
| <b>第八章 “一二·一”</b>    |     |
| 胜利的欢呼与内战的忧虑 .....    | 251 |
| 撕裂的“一二·五”之夜 .....    | 256 |
| “一二·一” .....         | 261 |
| 蒋介石的错误 .....         | 266 |
| 罢课与复课的博弈 .....       | 273 |
| <b>第九章 反苏运动中的联大</b>  |     |
| 东北问题的由来 .....        | 287 |
| 张莘夫事件 .....          | 290 |
| 联大师生的反应 .....        | 292 |
| 教授的绝望和厌倦 .....       | 295 |
| <b>后记</b>            |     |
| <b>参考文献</b>          |     |

## 第一章 南渡：空前绝后的西南联大

国立西南联合大学（简称“西南联大”或“联大”），是一所被誉为“民主堡垒”的大学，它创造了无数的奇迹，记录了民国的风云，留下了诸多的谜题……

它就像一个战争中的神话，空前绝后却昙花一现……

1937年，卢沟桥的炮声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，为保存文化命脉，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所高校南渡西迁，1938年5月4日，颠沛流离的师生们终于汇集到了昆明，彩云之南。八年的时光，



西南联大校徽及钢印印模

西南联大长成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，顶天立地，它分出思想自由、民主堡垒、通才教育、教授治校的枝桠，每一枝都是宝贵的精神资源。

植根于抗战时期的神话，自诞生就带有爱国情怀和政治色彩，神话破灭于历史的剧烈变动之中。这棵大树是怎样消逝的，其生存的土壤，又是怎样被历史的风暴和激流带走的呢？

美国学者易社强在《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》导言中写道：“在一个饿殍遍野、贫病交加、充满社会不公和暴政的世界，即使是‘正常’的年代，批判性思维、多元主义、宽容和思想自由的原则到底有多重要？”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必须把西南联大放在现代史的格局里面去考察，聚焦考察联大和国民政府、民主党派的关系，或者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国家命运的关系。

让我们踏上西南联大的来时路，追寻它的足迹，探索埋藏在历史中的文化教育之根。



## 仓皇的北平

1937年7月7日，清华大学教授冯友兰和几个朋友在北平香山饭店吃饭，下午回到清华园，有人给他打电话，说西直门关了，不知出了什么事。第二天，冯友兰才得知，中国军队和日军在卢沟桥开火了。

对于卢沟桥的炮声，在庐山参加会谈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，在南京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，甚至包括在北平的师生和驻北平的守军，都认为这只是中日之间的一次军事冲突。然而，过了一周，形势急转而下，清华教务长潘光旦、秘书长沈履给梅贻琦的电报中说，“和平绝望，战机已迫”。形势紧张，清华大学教授疏散到北平城内。

卢沟桥的炮火并没有让北大、清华的招生工作陷入停顿，两校联合招生的12000份试题，就是7月10日在红楼地下室印出的，北大研究生院招生试题于7月13日印制。

7月28日拂晓时分，日军从西、南两面向南苑夹击，切断了南苑与北平的所有交通，又以数十架飞机低空轮番轰炸，片刻不停。轰炸万寿山麓的日本飞机从清华园上空掠过，一声巨响将朦胧中的师生们从梦中惊醒，大家纷纷跑到早就商定好的躲避轰炸的避难所——建筑坚固的图书馆和科学馆。10时半许，一颗炮弹落在图书馆楼后，虽然陷入烂泥没有爆炸，却着实让人吃惊不小。新南院南侧清华车站旁的天丰煤站，也落了一颗炮弹。29日，二十九军被迫退出北平，古都北平沦陷了。

七七事变爆发前，校长蒋梦麟、文学院院长胡适等都因赴庐山参加谈话会而离开了北平，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教授、课业长樊际昌教授等亦相继南下，校内事务由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负责。日军包围北平时，有人建议给学生每人发二十元，使其迅速离校，郑天挺采纳了这一建议，所以北平陷落的时候，北大校园里已没有学生了。

日本军队在进攻和占领北平、天津后，迫不及待地对中国的教育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摧残和劫收。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的校园虽未被彻底摧毁，但前者惨遭洗劫，成了日军的医院，后者则按日本的帝国大学模式改造，天津的南开大学更是遭到灭顶之灾。

7月28日午夜，日军用密集的炮火彻夜轰击南开大学，29日又派飞机以南开为目标，对天津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连续轰炸，之后，又将军车开进南开，将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点火烧毁。南开大学的秀山堂、木斋图书馆、芝琴楼女生宿舍、单身教授楼和大部分平房均被夷为平地。南开中学部的西楼、南楼和小学部的教学楼也成了一片废墟。南开的一口重18000斤、铸有全部《金刚经》的大钟也被日军拉走，熔为做枪炮弹的材料。

在国破家亡的生死关头，为了让中国教育文脉得以延续，为了建国复兴的教育大计，使无校可归的师生不致失学当亡国奴，受奴化教育，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、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、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、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、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、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，揭露日本侵略军破坏我国教育机关的罪行。提出



了“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”的口号，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，将一些高校迁往内地办学。

1937年9月10日，教育部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南设立临时大学。长沙方面，以南开校长张伯苓、北大校长蒋梦麟、清华校长梅贻琦、教育部代表杨振声、教育部次长周炳琳、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、北大教授傅斯年、南开大学教授何廉、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、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，并指定张、蒋、梅为常委，杨为秘书主任，负责长沙临时大学的筹备工作。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为班底，接收三校流亡学生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中国学术界开始了大迁移。中国的知识阶层投身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，开始了南渡之旅。何为南渡？“稽之往史，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，偏安江表，称曰南渡。”各大学教授和学生冒着生命危险，纷纷踏上南下的旅程，这样的迁移带有慷慨悲壮的色彩。

1937年8月12日，沈从文撤下家小，和一大批北大、清华的教授乔装打扮后，撤离北平，搭乘卢沟桥事变后第一次平津通车到天津。同行的有杨振声、梅贻琦（清华大学校长）、叶公超、周培源、朱光潜、钱瑞升、张奚若、梁宗岱等。到达天津时，已经半夜。由于津浦铁路中断，当时北大、清华的师生先到天津，接着乘轮船到青岛，沿着胶济铁路到济南，然后再南下。这一批辞别五朝宫阙的学者，就像学术界大迁移的序曲，在匆促又仓惶、悲愤又雄壮的旋律中奏响。

9月7日，冯友兰、吴有训离开北平。就在前一天夜晚，两人还在清华保护学校。告别故都前夕，冯友兰写道：“吴正之（有训）同我在清华巡逻，皓月当空，十分寂静，吴正之说‘静得怕人，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’。我忽然觉得有一种幻灭之感……后来我读到清代诗人黄仲则的两句诗：‘如此星辰非昨夜，为谁露中立中宵。’我觉得就是写的那种幻灭之感。我反复吟诵，更觉其沉痛。”

9月14日，沈履、陈福田、潘光旦与赵世昌离开清华园。两天后，开始了行程。潘光旦在途中开始写《图南日记》。记录其从北平到长沙的经历。